

周立波的晋察冀边区印象

1937年底到1938年初,周立波(1908-1979,湖南益阳人,中国现代作家、编译家,与赵树理并称“南周北赵”)作为随行翻译和记者,陪同时任上海美国总领事馆海军武官和美军军事观察员的埃文斯·卡尔逊对晋察冀边区进行考察。在52天中,周立波采访了边区的领导人、军队和普通民众。1938年3月到武汉后,周立波将采访笔记和见闻整理成《晋察冀边区印象记》一书。该书是关于晋察冀边区最早的一次新闻和历史书写,也是第一部全景式记录晋察冀边区的报告文学。

“热烈广阔的群众运动”

在晋察冀边区,周立波细心地看到,武装抗日斗争不仅是军队的事情,而且已成为边区民众自发的群众运动,因而他深有感触地说:“华北的抗日运动,已经不是单纯的军队武装的抵抗,而是一种热烈广阔的群众运动了。”同时,周立波还看到,晋察冀边区的武装抗日斗争由于得到了广大民众的支持,在情报方面做得很好,“能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和掩护,可以迅速地获得敌人行动的情报,又可以机密的封锁自己的军情”。边区民众积极参加游击队。游击队员不脱离生产,他们打

完仗赶回家,还要赶着牛或骡子下地干活。

晋察冀边区军民昂扬的斗争精神和紧张有序的地面景观,给予了周立波极大振奋,他看到“我们的攻击精神很旺盛,善于白刃战。我们的步兵在山路上移动得很迅速,惯于奇袭、突袭、夜战和埋伏”。正是晋察冀边区军民的这种英勇斗志,使得边区“用少数的兵力和并不优良的兵器打退了敌人几十次的进攻,消耗了他们的人力和财力”。

然而,周立波也看到了日寇在学习我们的游击战术。但是周立波强调,日寇虽然机械地学习了边区子弟兵的游击战争,但他们不知道“游击战争是一种武装的群众运动,是只有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,为自卫为正义而战的部队才能运用的”。周立波同时记录了日寇军队的缺点:攻击精神差、移动不灵活、不惯白刃战、不爱夜战、不善山地战、给养繁重、指挥呆板。

“都是那么匆忙”

农业是根据地的重要生活物资来源和战时物资依托,因而边区政府很重视农业生产。

周立波看到,边区政府鼓励个体农民或农户抢荒种地,不论

官荒还是私荒,只要经地方政府核定过的,都准许农民自由开垦,并且地主不得要求收回或禁止,更重要的是,垦荒农民在抗战期间不纳地租。

战时为了防止出现新荒,边区政府也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。如果是经炮火破坏造成农家耕畜、农具、种子散失的话,边区政府无偿分给其各种必要的生产物资以恢复其生产。若是因农民参加抗战而脱离了生产,或因农民参战而伤亡者,其田地由农会组织其他农民代耕,或由无地或少地及难民失业者帮助耕种。

周立波观察发现,由于战乱,原在天津、太原等地的失业工人现集中在边区。边区政府为了安置这些人,大力发展手工业,并奖励旧的家庭工业。

周立波看到,中国共产党在边区实行贸易自由的商业政策,边区商人甚至可以直接到敌占区做买卖。为了解决粮食问题,边区把一些棉花用地改种谷物。边区设立了贸易局,民众把河北的棉花运输到山西卖,把山西的粮食买回到河北。

由此周立波感慨,晋察冀边区各行各业、各年龄段的人都在忙碌着自己的事业,“从小孩子一直到老人家,从小脚的农妇一直到朴素的大学生,从农民工人一直到兵士,都是那么匆忙”,他们都在忙碌,共同一个目的就是打败日本侵略者。

“抗日高于一切”

“抗日高于一切”是周立波在晋察冀边区强烈感受到的一个口号,边区的教育文化也紧紧围绕这一口号来开展。周立波看到,边区政府一般实行实践教育,主要教青年和儿童在实践斗争中学习,儿童团和歌咏队成为儿童教育的主要形

式,边区儿童能唱多首救亡歌曲宣传抗日。小小年纪就担起了抗日救国的大任。

周立波参观了边区的军校,这所军校共有500名学生。这些学生文化基础比较好,大部分是山西、河北的中学生,也有几十个平津地区的大学生,其余还有青年工农和游击队干部。军校统一供给食宿,吃小米,穿的是国民党军队撤退时扔掉的衣物。军校宿舍内陈设简单却整洁,课程表也贴在宿舍墙壁上。

课余时间,学生们会合唱救亡歌曲,也会在军校救亡室里休息和娱乐。救亡室里有台球和其他简单的娱乐品。周立波看到,学生们在救亡室娱乐和休息时也不会忘记学习,救亡室里的图表、画像、壁报、卡通等,都会成为他们政治和军事学习的重要资源。

军校里最让周立波惊讶的是各式的军事和政治沙盘,这些沙盘一般放在救亡室、办公室的门外两边以及学生宿舍外——学生们用砖和石头砌成小框子,里面平铺上黄沙,再用黑色或其他颜色的碎石砖摆成军事地图,显示当前的军事、政治形势以及游击战术图解。在周立波看来,这些军事和政治沙盘,不仅教会了学生们军事战略战术,而且也很好地对他们进行了宣传教育。军校操场里有练习翻越高墙的高墙,有练习走险路的独木桥,为了锻炼学生们的军事战术,他们每周有几个钟点到操场构筑战壕。

军事教员大多是富有战斗经验的军队干部,政治教员有的是军队高级干部,有的是平津高校的教师。军校师生们在课余还会帮助周围的老百姓干活。周立波参观军校时正赶上旧历新年,附近老乡们为师生们送来了猪、鸡和鸡蛋,军民朝夕相处,感情很深。 据《党史博采》王铁柱/文

张大千为常书鸿画“蘑菇分布图”

1941年3月,张大千和儿子张心智等人,风尘仆仆来到向往已久的敦煌,在莫高窟中开始了为期两年多的历代壁画临摹。1943年3月,留法画家常书鸿受命筹建敦煌艺术研究所,一行6人也来到了敦煌。

此时,张大千的临摹工作已接近尾声,他为常书鸿安排了住处,又下厨为常书鸿接风洗尘。两个月后,张大千离开敦煌时,将关于敦煌的调查资料、记录和研究成果等留了下来,供常书鸿参考。

临别前,张大千握住常书鸿的手,半开玩笑地说:“我们先走

了,而你却要在这里无穷无尽地研究保管下去,这是一个‘无期徒刑’呀!”随后,张大千将自己手绘的一幅图交到常书鸿手里,叮嘱他等自己离开了才能打开。

张大千一行离开莫高窟后,常书鸿打开纸卷,发现是一幅《莫高窟月牙泉蘑菇分布图》,上面详细标明了采摘蘑菇的地点、数量和时间等。常书鸿看了不禁一阵感动,因为莫高窟位于戈壁之中,食物特别匮乏,尤其是蔬菜极为罕见,张大千把自己发现的“蘑菇分布图”赠送给常书鸿,就是让他们可以改善饮食。

据《人民政协报》周惠斌/文

